

# 界定何為翻譯——從歌曲翻譯的受眾調查談起

戴遠君<sup>1,2</sup> 伍志偉<sup>3</sup>

**Address:** <sup>1</sup>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Xi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Guangzhou, China

<sup>2</sup>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sup>3</sup>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Bilingual Stud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E-mail:** <sup>1,2</sup>daiyuanjun@xhcom.edu.cn ; <sup>3</sup>zhi-wei.wu@polyu.edu.hk

**Correspondence:** Zhiwei Wu

**Citation:** Dai, Yuanjun, and Zhiwei Wu. 2022. “Defining Translation: A Reception study of Song Translation and Beyond.” *Translation Quarterly* 103: 27-38.

## Abstract

Defining translation: A reception study of song translation and beyond (by Yuanjun Dai and Zhiwei Wu)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finition and reception of (song) translation from two approaches: criterial and relativistic. An audience reception study was conducted on 286 Chinese participants (143 music-maj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nd 143 translation-maj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ho listened to three versions of Lemon Tree (i.e. the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an almost-all-Chinese version by Joanna Wang, and a half-English-half-Chinese version by Will Jay).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whether Joanna's version and/or Will's version could be regarded as a translated version. They also provided their explanations of their decisions.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showed that (a) more than half of the participants believed that neither Joanna's version nor Will's version could be regarded as a translation and (b) statistically more music-major students believed that Will's version could be regarded as a translation.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discovered three major themes that emerged from the students' explanations: music, lyrics, and re-presentation. Specifically, “semantic equivalence” in the lyrics was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criteria and “transfer into another language” was the second most frequently mentioned criteria. The students were also keenly aware of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lyrics were adapted and re-created, hence a clear preference to make 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 distinct from “adaptation” and “re-creation”. Building on these finding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issues of the criterial and relativistic approaches to defining (song)*

*translation. The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necessity and benefits of combining both approaches so that transl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can be bridged and mutually informing each other.*

## 一、引言

翻譯研究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學界對翻譯研究範圍的探討持續不斷。要界定翻譯研究的範圍，首先要界定翻譯的內涵，因此關於翻譯定義的討論也沒有停歇。誠如 Tymoczko (2005, 1084) 所言，“大多數翻譯學者都希望界定何為翻譯的階段已結束”，但是“界定翻譯的任務尚未完成，且在未來數十年的翻譯研究發展中，仍是一項核心的任務”。隨著翻譯學科的不斷發展，翻譯定義變得多元化，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學者希望不斷拓展翻譯研究的範圍。例如，Korning Zethsen & Hill-Madsen (2016) 認為：翻譯的內涵應該變得寬泛。他們認為語內轉換也應納入正統翻譯的範疇 (translation proper)，但是以往的正統翻譯只涉及語際轉換 (Jakobson 1959)。翻譯內涵的拓展無疑有助拓寬翻譯研究的疆域，但是翻譯研究者所關注的現象是否越來越遠離翻譯實踐者和翻譯受眾所認知的翻譯？這種認知的差別會導致研究與實踐的脫節，不利於翻譯學科與翻譯行業的良性互動發展。有鑑於此，本文通過受眾調查方法，找出受眾對翻譯的期望。本文選擇歌曲翻譯為調查切入點，因為歌曲翻譯不純粹考慮文字，還需要考慮音樂對文字的影響，這與往常的純文字翻譯不同。如果受眾對這種形式的期望是寬泛的，那麼學者所提倡的寬泛的翻譯定義與受眾能取得一致；如果不一致，那麼有必要進一步思考翻譯的內涵，如何讓學術探討與翻譯實踐現象相聯繫，在名與實之間找到平衡。

## 二、翻譯的定義與歌曲翻譯的定義

### 2.1 翻譯定義的兩個思路

如何為翻譯下定義？Korning Zethsen & Hill-Madsen (2016) 指出有兩個總體思路。思路一是“基於標準” ( criterial approach )，思路二是採用“相對主義” ( relativistic approach ) 的方法。如果採用“基於標準”的思路，翻譯的內涵是固定的，因為只要達到所界定的標準，則視為翻譯。最常見的標準是“對等” ( equivalence )。例如，Catford (1965, 20) 認為翻譯是“用另一種語言 (目標語) 的對等文本替換一種語言 (源語) 的文本”；而 Nida & Taber (1982, 12) 認為“翻譯是用最貼切、自然的對等目標語言，在語義和風格上再現源語的信息”。如果採用“相對主義”的思路，翻譯的內涵並不固定，會因目標受眾的看法而改變。典型的“相對主義”定義的例子是 Toury 與 Chesterman：“翻譯是在目標文化中被認可為翻譯的任何文本” ( Chesterman 2016, 57)。換言之，某個文本是否算作翻譯並不取決於某個標準是否得到滿足，而在於目標受眾是否把該文本視為翻譯。

顯而易見，“相對主義”思路下的翻譯內涵具有很大的彈性，能拓展翻譯研究的

範圍。當然，也有學者採用“基於標準”的思路來拓展翻譯的內涵。例如，Korning Zethsen & Hill-Madsen (2016) 認為，傳統意義的翻譯只涉及語際轉換，沒有包括語內轉換與符號之間的轉換 (Jakobson 1959)。他們提出以下標準，拓展翻譯的內涵：(1) 存在某個(文字或非文字的)源文本；(2) 目標文本衍生於源文本，形式可以是另一種語言、體裁、媒介或符號系統；(3) 兩者的關係是相關的相似性 (relevant similarity)，因目的(*skopos*)不同會出現多種表現形式 (Korning Zethsen & Hill-Madsen 2016, 705)。只要滿足上述三項標準，則能視為翻譯。因此，語內轉換(如：古漢語轉換為現代漢語)、改寫(如：長篇小說改寫為兒童讀物)、改編(如：小說拍成電影)在上述的定義下，都可以稱作翻譯。此外，“對等”已不再是翻譯的重要標準，只要源文本與目標文本在某種程度上相關、存在一定的相關相似性，則可稱作翻譯。

翻譯內涵的拓展無疑為學者帶來更多的研究機會，不局限於傳統研究所關注的語際轉換。然而，Hermans (1995) 指出，大眾所認知的翻譯與學者所定義的翻譯未必一致：大眾所理解的翻譯是字典裏所定義的翻譯、翻譯從業者所開展的翻譯實踐、學校所教授的翻譯。而這些認知往往是基於傳統意義的語際轉換。例如，Newmark (2000, 60) 認為法語詞典 *Petit Robert* 對翻譯的定義甚佳：“一種語言所表述的內容用另一種語言來表述，旨在實現兩種表述的語義對等與表現力對等”。換言之，在翻譯實踐領域，普遍的認知是傳統的，專指意義對等的語際轉換，並非部分學者所主張的各種不同形式的轉換。本文將從歌曲翻譯這一非純文字翻譯切入，探究受眾對這種形式的期望，從而進一步思考翻譯的內涵和定義。

## 2.2 歌曲翻譯的兩個定義

由於翻譯定義標準不同，歌曲翻譯的內涵也莫衷一是。比較典型的兩個歌曲翻譯定義如下。Franzon (2008, 376) 認為，如果目標語版本重現了以下三項中至少一項，就能視之為原曲的翻譯：音樂、歌詞或歌唱表演 (*sung performance*)。Franzon (2008) 進一步指出，歌曲翻譯有以下五個選項：(1) 不翻，保留原曲；(2) 只翻譯歌詞，不考慮原曲音樂；(3) 為原曲音樂填新詞，與原曲歌詞沒有聯繫；(4) 翻譯原曲歌詞並對原曲的音樂作調整，有時候調整幅度較大，成為一首新歌；(5) 根據原曲音樂改編歌詞。可見，Franzon 的歌曲翻譯定義相當寬泛，與上文提及 Korning Zethsen & Hill-Madsen (2016) 的翻譯定義有類似之處：只要原版與譯版有一定聯繫(音樂、歌詞或歌唱表演)，則可視為歌曲翻譯。

然而，Low (2013) 對歌曲翻譯的定義卻並不寬泛。他提出要嚴格區分歌曲“翻譯”、“改編”以及“替代文本” (*replacement text*) 這三個概念。他認為，歌曲翻譯與其他形式的翻譯不同，很難追求完全忠實；如果要求歌詞翻譯完全忠實，那麼翻譯版本可能無法演唱。因此，歌詞翻譯可以修改一些無關緊要的細節，但翻譯仍需要在合理範圍內忠實於原曲的歌詞，不能隨心所欲、自由發揮。如果翻譯的歌詞與原曲的重要內容不符，那麼只能算作改編。此外，如果為歌曲重新填詞，新詞與原曲的歌詞沒有任何聯繫，這稱作“替代文本”。由此可見，Low (2013) 界定歌曲翻譯的標準是：另一個版本的歌詞在多大程度上再現原曲歌詞的意思。如果保存了重要的語義信

息，則視為翻譯；如果只保存了一些次要信息，則視為改編；如果沒有保存任何語義信息，那麼就是“替代文本”。這個翻譯界定的標準比 Franzon (2008) 要窄，因為 Low (2013, 231) 指出“為了清楚起見，不同的現象需要不同的名稱，在學術話語中尤為如此”。此外，對於受眾而言，不同的名稱也會有不同的效果。“翻譯版”、“改編版”以及“替代文本版”（即“重新填詞版”）會引起觀眾不同的期望。如果後面兩個版本也冠以翻譯之名，則會誤導觀眾，讓觀眾誤認為改編或重新填寫的歌詞是原曲作詞人所表達之意。

上述兩個歌曲翻譯的定義均從“基於標準”的思路來界定。如果遵循“相對主義”的思路，我們可調查歌曲翻譯在目標文化中的接受程度。Toury (1995) 提倡讓目標文化界定何為翻譯，只要目標文化認可就能視作翻譯。然而，Pym (2007) 指出，Toury 並沒有進一步解釋是目標文化的哪個群體去界定翻譯。本文認為，在“相對主義”思路下，應交由翻譯作品的潛在受眾或譯員去界定何為翻譯，因為受眾和譯員是目標文化主要的群體，對翻譯有具體的期望，從而形成目標文化對翻譯的約定與規範。Hermans (1995, 8) 對“期望”(expectation)、“約定”(convention)、“規範”(norm)三個概念有以下的區分。約定及規範均與期望有關，但“約定是純粹基於概率的期望”。約定形成後，大家會大概率循此行事。規範除了包含大概率的期望，還隱含一些判斷：該做法是否合適妥當，大家是否必須遵守。迄今為止，尚沒有研究調查受眾如何看待歌曲翻譯。受眾更傾向於像 Franzon (2008) 那樣寬泛看待歌曲翻譯，還是如 Low (2013) 那樣嚴格區分翻譯、改編與重新填詞？此外，如果受眾能進一步指出為什麼某個版本能算作翻譯，我們能分析出他們的期望，從而推測目標文化群體對翻譯定義的約定理解。因此，下文將彙報一項歌曲翻譯的受眾調查，嘗試用實證數據勾勒出歌曲翻譯內涵的邊界乃至翻譯內涵的邊界。

### 三、受眾調查

#### 3.1 調查對象及內容

本研究調查對象為 286 名本科學生，其中 143 名為音樂專業學生，另外 143 名為翻譯專業學生。調查內容是兩個版本的 *Lemon Tree*（檸檬樹，原唱樂隊是 Fool's Garden）。版本一由王若琳演唱，歌詞絕大部分為中文，只有幾個英文單詞。版本二由 Will Jay 演唱，歌曲有一半以上採用英文原歌詞，中間部分採用了王若琳版本的歌詞。學生按順序聽英文原版、版本一、版本二，然後回答兩個問題：版本一與版本二哪個可視為 *Lemon Tree* 的翻譯版本？為什麼？第一個問題是單項選擇題，從四個答案中選出一個：兩個均是、兩個均不是、王若琳版、Will Jay 版。第二個問題是開放問題，學生解釋上述選擇的原因。學生使用中文作答，字數不限。

### 3.2 調查分析

本研究結合量化及質化分析。第一個問題，根據兩個組別學生的選擇做卡方檢驗，以考察是否存在組間差異。第二個問題，採用質化分析的標注方法 (Miles, Huberman & Saldaña 2014)。首先，兩位作者分別對學生回答做描述性標注，用短語、詞組歸納學生的回答。例如，“因為 Will Jay 屬翻唱，王若琳的屬改寫歌詞，兩者跟原文的意思都不對等”，該回答標注為“翻唱改編”與“意思不對等”。第二階段，作者進一步分析前一階段所做的描述性標注，把相同類別的標注歸為一類。在此過程中，作者參考了現有音樂翻譯文獻中提及音樂翻譯需注意的因素 (Franzon 2008; Gorlée 1997, 2005; Low 2003, 2008, 2013, 2017)。經過作者之間的討論，學生所給的回答可歸為三大類別：音樂、歌詞、再現 (re-presentation)。例如，上文提及的標注“翻唱改編”歸為再現類別，“意思不對等”歸為歌詞類別。

### 3.3 量化分析結果

卡方檢驗結果顯示，兩個組別在四個選項的期望頻數均大於 5，滿足卡方檢驗的條件。此外， $\chi^2 = 18.6, p < 0.001$ ，顯示不同專業學生所做出的選擇有所不同。經過組間事後檢驗進一步發現，兩組學生在其中兩個選項上存在差異（見表 1）。翻譯專業學生比音樂專業學生更傾向認為兩個版本均不能算作原曲的翻譯，而音樂專業學生比翻譯專業學生更傾向認為 Will Jay 版本能算作原曲的翻譯。雖然兩組學生的選擇存在一定程度的組間差異，但“兩個均不是”的選項在兩組中都是最多人選擇的。

表 1: 兩個組別學生的選擇頻次

組別	兩個均不是	兩個均是	王若琳版	Will Jay 版	小計
音樂專業	62	16	28	37	143
翻譯專業	95	12	22	14	143
小計	157	28	50	51	286

### 3.4 質化分析結果

本小節彙報受試對開放問題回答的質化分析。須指出，由於受試給出的原因會多於一個，因此在表 2 到表 5 中，各細類小計之和會大於音樂專業與翻譯專業學生做某項選擇之和。例如，在表 3 中，認為兩個版本均是翻譯的原因歸類頻次是  $30 (5 + 4 + 14 + 6 + 1)$ ，大於認為兩個版本均是翻譯的音樂專業與翻譯專業學生之和  $28 (16 + 12)$ ，見表 1)。

表 2 彙報了兩個版本均不可視為翻譯的原因歸類。表中數據顯示，受試最關注的是歌詞，最少關注的是音樂。受試提及最多的原因是兩個版本歌詞的意思均與原版不一致 (56.1% 或  $88/157$ )。其次，超過一半的受試明確指出這兩個版本在不同程度上改編或重新填寫了歌詞 ( $44 + 38 = 82$  或 52.2%)，因此不能視作翻譯。另外一點值得

關注，有 20 位受試認為，由於兩個版本的歌詞存在中英夾雜現象，沒有完全翻譯為中文，因此不能視作翻譯。

表 2: 兩個版本均不可視為翻譯的原因歸類

類別	回答例子	音 樂	翻 譯	小 計
		專 業	專 業	
		學 生	學 生	
<b>音樂</b>				
押韵	因為這兩個版本的歌詞很多都是為了押韵而重新作詞，並不是直接翻譯原來的英文歌詞	5	10	15
曲調	因為 Will Jay 的歌詞和曲調都和原作品有所不同	4	10	14
音樂 風格	兩種的味道都與原作不太一樣。王若琳和 Will Jay 爵士的感覺更重。	2	8	10
<b>歌詞</b>				
意思	因為我聽到的王若琳版本和原版的翻譯是不一樣的，歌詞意思不同	35	53	88
中文 佔比	因為王的版本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另一個語言，而另一個只有一半左右，不能讓英語或中文母語的人聽懂整首歌。	3	17	20
主題	原作品表達的是我感到孤單和無助，我筋疲力盡想自我封閉，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想做的是甚麼，另外兩個版本表達的是對愛的理解	3	6	9
<b>再現</b>				
改編	兩個都有經過改編，不是按原作全篇翻譯的	10	34	44
重新 填詞	Will Jay 版後面的中文和王若琳版的中文都是重新填詞。	5	33	38

表 3 彙報了兩個版本均可視為翻譯的原因歸類。表中數據顯示，最多受試關注的仍為歌詞。有趣的是，表 3 呈現的兩個觀點恰好與表 2 相反。首先，在表 3 中，最多受試（50% 或 14/28）提及的原因是兩個版本均有中文的出現，因此均可視為翻譯，儘管歌詞並沒有全部翻譯為中文。這與上文彙報的理由（沒有完全翻譯為中文，因此不能視為翻譯）完全相反。此外，有 7 名受試認為，不同程度改編或重新填寫歌詞也可以視為翻譯，因為歌曲的其他元素與原曲類似，不需要苛求忠實原曲的歌詞。這個

觀點也與上文提及的相反——只要歌詞意思變化了，就應視為改編版本或重新填詞的版本。

表 3: 兩個版本均可視為翻譯的原因歸類

類別	回答例子	音 樂	翻 譯	小 計
		專 業	專 業	
		學 生	學 生	
<b>音樂</b>				
曲調	他們唱得與英文的旋律一致，表達的情感也相差不大，我認為都算是原文的翻譯版本。	3	2	5
<b>歌詞</b>				
意思	歌詞大致表達的意思跟原版的差不多。	1	3	4
中文佔比	因為 Lemon Tree 本來是英文歌曲，但 Will Jay 和王若琳的版本都是中英結合。部分歌詞被翻譯成了中文。	9	5	14
<b>再現</b>				
改編	兩版本均包含原版的元素，在其基礎上做了自己的創編。實際還是在原作品的基礎上演唱的。	3	3	6
重新填詞	雖然歌詞和原版差別很大，但我認為也算一種翻譯。歌的傳播和其他的傳播不同，我認為是可以大幅度改動歌詞，不必忠實原文的。	0	1	1

表 4 彙報了王若琳或 Will Jay 版本可視為翻譯的原因歸類。表中數據顯示，受試回答的理由比較分散，沒有某一個理由達到或超過半數。其中，最多受試提及的原因是某個版本的歌詞意思更接近原文（28.7% 或 29/101）。須指出，Will Jay 版本的中文歌詞與王若琳版本並沒有差別，但依舊有受試認為其中一個版本的歌詞與另一個版本不一樣。第二個較多受試提及的原因是歌詞的中文佔比（27.7%）。由於王若琳版本的中文佔比更大，因此更多受試認為相比之下是翻譯版本。此外，由於兩個版本都存在再創作的元素，23 名（15 + 8）受試會把再創作程度較低的版本視為翻譯，而程度較大的視為改編或重新填詞版本。

## 四、界定何為翻譯

上文第三節通過實證調查，分析了受眾所認知的音樂翻譯乃至翻譯的看法。以下的討論圍繞上文第二節提及的“基於標準”以及“相對主義”兩個思路來展開，從多

表 4: 王若琳或 Will Jay 版本可視為翻譯的原因歸類

類別	回答例子	音 樂	翻 譯	小 計
		專 業	專 業	
		學 生	學 生	
<b>音樂</b>				
曲調	王若琳的音樂伴奏，曲調與原作品沒有太大的差異	13	5	18
音樂風格	配器和風格沒有做太大變動	8	3	11
<b>歌詞</b>				
意思	歌詞來看，王若琳的比較相似。	19	10	29
中文占比	因為首先王若琳的版本是全中文的，然後 Will Jay 的版本是中英文結合的。	16	12	28
主題	因為 Will Jay 的版本比較偏向於歌名 Lemon Tree 本身，整首歌都是圍繞這個展開的，言語中也有點翻譯的感覺。但是王若琳的完全就是中式的改編，也跟歌名沒有多大關係了。	6	1	7
<b>再現</b>				
改編	王若琳版在原來的歌詞裏進行了改編，形成了更貼近中文歌市場的情歌，Will Jay 版的更貼近歌詞	5	10	15
重新填詞	Will Jay 在原版基礎上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填了中文歌詞，而王若琳則是改變了原有歌詞的意思進行重新填詞。	6	2	8

方面論述翻譯的內涵。

#### 4.1 受眾認知與歌曲翻譯的標準

如本文第二節所述，不少翻譯學者都試圖擺脫以“對等”為標準的傳統翻譯定義，從而拓展翻譯研究的內涵 (Kornig Zethsen & Hill-Madsen 2016)。在歌曲翻譯的定義中，也有學者提出比較寬泛的標準，只要與原曲有聯繫，即使重新填詞也可視作翻譯 (Franzon 2008)。然而，從上文的調查結果可見，“意義對等”依舊是受眾判斷作品是否能視為翻譯的首要標準。在眾多因素中，“意義對等”是提及頻次最高的一個。此外，受眾還會根據再創作的程度，指出相應的版本是改編版還是重新填詞版。這與 Low (2013) 提出要區分翻譯版、改編版與替代文本版的觀點十分一致。本次調查的範圍是中文受眾，他們很重視“對等”的標準，這與西方傳統對該標準的重視十分吻合。誠如 Chesterman (2006, 9) 所言：“在西方翻譯理論中‘對等’概念起著核心作用

……我們需使用其他術語（例如改編）來描述其他不那麼對等的翻譯類別（*freer types of translation*）”。

上述調查還發現，中文在譯文中所佔的比例也是受眾判斷是否為翻譯的常見標準。從頻次來看，如果中文佔比越大，越多受試會視之為翻譯。有趣的是，有一小部分受試認為，只要翻譯為中文，即使意思不對等或中文佔比不多，也可視為翻譯。這些調查結果顯示，“語際轉換”也是受眾判斷翻譯的標準。這與 Jakobson (1959) 提到的正統翻譯（*translation proper*）範疇強調語際轉換的標準一致。以上兩個標準均是傳統（或正統）翻譯定義的重要標準。可見，受眾所認知的翻譯並非部分學者所提倡的寬泛的翻譯。即使在歌曲翻譯這類比較特別的文本中，押韻、曲調、音樂風格只是次要因素，歌詞的意義對等、語際轉換才是重要的衡量因素。

## 4.2 “相對主義”思路的可行性探討

上文第二節提及，“相對主義”思路下翻譯的定義並不根據固定標準來衡量，而是根據受眾的接受程度來決定 (Chesterman 2016; Toury 1995)。然而，上述受眾調查反映出“相對主義”思路界定翻譯的定義存在兩方面問題。其一，哪個群體適合做出判定？Toury (1995) 提出只要目標文化認為某個話語（*utterances*）是翻譯或把某個話語呈現為翻譯，則可視為翻譯。Toury 提出這個寬泛的定義，是要從史學角度描述不同文化的翻譯活動，從而找出規範。該思路的好處是能盡可能涵蓋眾多文化裏與翻譯有關的活動，如偽譯（把原作當作譯文來呈現，《唐吉可德》為一例）。但是 Pym (2007) 指出，該由哪個群體來決定某個文本或話語能算作翻譯？研究員？歷史學家？本文選擇了翻譯作品的普通受眾為判斷主體，因為歌曲翻譯以及大部分翻譯作品都是為普通受眾而創作。因語文、語法等研究的需要而提供的翻譯，受眾確實是研究員，但這部分需求比普通受眾的需求少得多。由此，遵循“相對主義”的思路，我們可根據不同翻譯作品的目標受眾來選擇判斷主體，例如歌曲翻譯交由普通受眾來衡量，學術領域翻譯交由研究員衡量。然而，該做法也可能遇到如下問題。

“相對主義”思路的第二個問題是，即使交由同一個群體去判斷，群體內部也會產生不同的觀點。以本研究為例，在 286 名受試中，有 54.9% 認為兩個版本都不能視為翻譯，但是剩下的受試認為至少其中一個版本可視為翻譯。即使大家都看到了歌詞的改編甚至重新填寫，但再創作是否可以視為翻譯也有不同的意見（見表 2 到表 4 “再現”的例子）。此外，從受試所給出的原因可見，他們的感知並不完全可靠。例如，Will Jay 版本的中文歌詞與王若琳的版本實為一致，但有部分受眾卻認為其中一個版本意思上更接近原文。受試感知的不可靠與歌曲的呈現形式或許有關，因為 Will Jay 版本是中英夾雜，有明顯語言轉換的感覺，這種轉換的錯覺會讓部分受眾覺得更像翻譯。這能解釋為什麼有更多音樂專業學生認為 Will Jay 版本屬翻譯，而相比之下更少翻譯專業學生視之為翻譯。這個差別進一步說明了同質化的翻譯受眾群體幾乎不存在 (Chesterman 2016)，這也加劇了“相對主義”思路下翻譯定義的不確定性與多維特性。

### 4.3 兩種思路的融合

雖然“基於標準”的思路與“相對主義”的思路看似互斥，但根據上文彙報的受眾調查，兩種思路實有融合之處。如圖1所示，兩種思路都能產生翻譯內涵窄與廣的連續體（見長方塊的漸變顏色，底色深代表範圍偏窄，底色淺代表範圍偏廣）。基於標準的思路出發點是標準的界定。標準可按傳統翻譯限定為“意義對等”及“語際轉換”，也可以涵蓋範圍更廣的“衍生版本”與“相關相似”為標準。當然，不同情況下，標準可能處於連續體兩端之間。“相對主義”思路則需要根據受眾的期望來確定何為翻譯，而受眾之間的看法也不一而足，因此也可能處於連續體的兩端或兩端之間。即使受眾的看法不同，但仍可從各種回答中觀察到一定的概率（或頻次）。基於本文第二節提到 Hermans (1995) 對“期望”、“約定”與“規範”三個概念的論述，我們可以把頻次較高的受眾期望視為約定的翻譯標準。因此，在本次調查中，“意義對等”與“語際轉換”可視為目標文化對歌曲翻譯作品的約定標準。然而，這個約定標準或許並沒有上升到“規範”，因為有部分受試認為，歌曲翻譯不一定需要遵循這些頻次較高的期望（如：只要音樂元素相似，也可視為翻譯，見表4音樂類別的例子）。通過這兩種思路之間的互相對照與碰撞，我們可以更深刻地認識如下四個問題：(1) 目標文化受眾對翻譯作品的具體期望有哪些？(2) 在這些期望中，有哪些可視為翻譯的約定標準與規範？(3) 這些受眾反映出的約定、規範與學者所提出的標準有何異同？(4) 如果受眾期望是多元的、異於某個標準所界定的翻譯，是否有必要採用不同的標籤（翻譯、改編等）來區分不同類別的作品，以更好服務受眾的需求？上述四個問題需要結合“基於標準”的思路與“相對主義”的思路才能做出充分、全面的回答。因此，本文並不排斥某一個思路，而是提倡融合兩種思路，通過受眾調查的相對主義思路找出翻譯的期望，繼而與基於標準的翻譯定義相對照，通過理論思辨方法，分析翻譯的標準、約定與規範，從而界定何為翻譯並指導翻譯實踐。如此，兩種思路的融合能讓翻譯研究與翻譯實踐產生有機的聯繫，從而避免翻譯研究者與實踐者自說自話，無法對話“何為翻譯”及“譯有何為”。

## 五、結語

翻譯的定義一直是研究者探討的核心議題，不同研究者因翻譯研究的需要提出了“基於標準”與“相對主義”兩種不同的思路，在“何為翻譯”的範圍上持不同意見。本文通過考察受眾對歌曲翻譯的看法，發現傳統翻譯定義中“對等”與“語際轉換”是受眾較為認可的標準。如果中文版本的歌詞與英文版原曲的歌詞意思不對等，那麼受試傾向認為中文版本不能稱作翻譯。受試也會明確提到中文版本是重新填詞或改編，而不是翻譯。當然，受眾的看法也並非全部一致，也有一些受眾認為改編或重新填詞也可以算作翻譯。結合受眾的回答，本文討論了“基於標準”與“相對主義”兩種思路的不足。前者太固化，忽視了受眾期望的多樣性。後者則太遊離不定，難以在多元的受眾期望中抓住核心。因此，本文提出要結合兩種思路，讓受眾期望與傳統翻譯標準互相借鑒，讓研究者與受眾從動態、多維角度透視翻譯的約定與規範，共同勾勒出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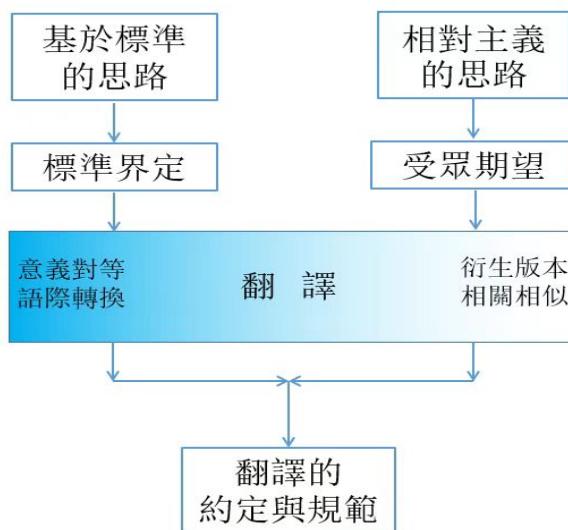


圖 1: 兩種思路的融合

譯活動的邊界。

### 基金資助

本文得到廣東高校科研平台和科研項目——特色創新類項目（哲學社會科學）（項目編號：2021WTSCX043）、廣東省高等教育教學改革項目“音樂文獻翻譯英漢平行語料庫應用研究”（項目編號：粵教高函[2019]335）的支持。

## 參考文獻

- Catford, John. 1965.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 Essay on Applied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sterman, Andrew. 2006. "Interpreting the Meaning of Translation." In *A Man of Measure: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Fred Karlsson on his 60th Birthday*, ed. by Mickael Suominen, 3-11. Turku: Linguistic Association of Finland.
- Chesterman, Andrew. 2016.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Revised e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Franzon, Johan. 2008. "Choices in Song Translation: Singability in Print, Subtitles and Sung Performance." *The Translator* 14(2): 373-399.
- Gorlée, Dinda L. 1997. "Intercode Translation: Words and Music in Opera." *Target* 9(2): 235-270.
- Gorlée, Dinda L. 2005. "Singing on the Breath of God: Preface to Life and Growth of Translated Hymnody." In *Song and Significance: Virtues and Vices of Vocal Translation*, ed. by Dinda L. Gorlée, 17-101. Amsterdam: Rodopi.

- Hermans, Theo. 1995. "Translation as Institution." In *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EST Congress*, Prague 1995, ed. by Mary Snell-Hornby, Zuzana Jettmarova, and Klaus Kaindl, 3-2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Jakobson, Roman. 1959.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On Translation*, ed. by Reuben A. Brower, 232-23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orning Zethsen, Karen, and Aage Hill-Madsen. 2016.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and its Place within Translation Studies—A Theoretical Discussion." *Meta: journal des traducteurs/Meta: Translators' Journal* 61(3): 692-708.
- Low, Peter. 2003. "Translating Poetic Songs: An Attempt at a Functional Account of Strategies." *Target* 15(1): 95-115.
- Low, Peter. 2008. "Translating Songs that Rhyme." *Perspectives* 16(1/2): 1-20.
- Low, Peter. 2013. "When Songs Cross Language Borders: Translations, Adaptations and 'Replacement Texts'." *The Translator* 19(2): 229-244.
- Low, Peter. 2017. *Translating Song: Lyrics and Tex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iles, Matthew, Michael Huberman, and Johnny Saldaña. 201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 Methods Sourcebook*. 3rd ed. Thousand Oaks: Sage.
- Newmark, Peter. 2000. "Taking a Stand on Mary Snell-Hornby." In *Translation in the Global Village*, ed. by Christina Schäffner. Lon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Nida, Eugene Albert, and Charles Russell Taber. 1982.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Leiden: Brill.
- Pym, Anthony. 2007. "Natural and directional equivalence in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Target* 19(2): 271-294.
- Toury, Gideon.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Tymoczko, Maria. 2005. "Trajectories of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Meta* 50(4): 1082-1097.